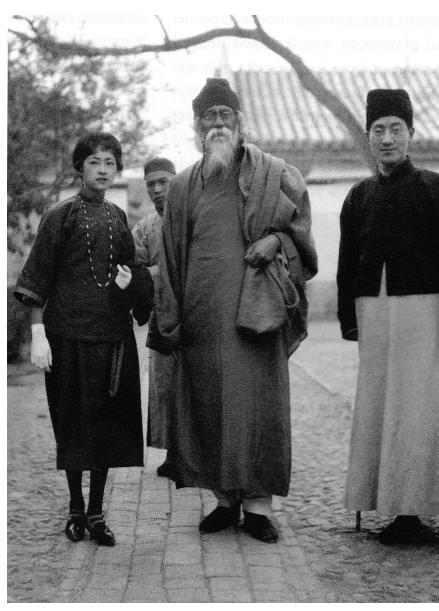


■纪念



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与林徽因(左)、徐志摩(右)合影

今年适逢印度大文豪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诞辰150周年及逝世70周年，对外友协筹办了盛大的纪念活动。欧美评论家曾将纪伯伦的《先知》和泰戈尔的《吉檀伽利》共誉为“东方最美妙的声音”。我们还清楚记得半个多世纪前，在北大读到这两本书时，立即被这“东方最美妙的声音”深深吸引。后来又陆续读过泰戈尔的《园丁集》《飞鸟集》《新月集》……那时在国内大政治气候的影响下，学校的政治运动“红专辩论”、“反右”、“反右倾”等一个接着一个。这“东方最美妙的声音”显然与辩论会上激烈的争辩声、批斗会上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不相协调。而我们却像诗人臧克家形容的“如食异味，越食越贪”，运动间隙，常猫在燕园哪个角落，沉迷在这“东方最美妙的声音”中……

女作家冰心曾说过《先知》与《吉檀伽利》“有异曲同工之妙”。上世纪80年代，我们奉命到黎巴嫩任职，受纪伯伦博物馆馆长库鲁兹先生之托，代博物馆找寻一本冰心译的《先知》，有幸与冰心老人结识，曾听她这样品评过纪伯伦与泰戈尔，她说：“泰戈尔是贵族出身，家境优越，自幼受过良好教育。他的作品感情充沛，语调明快，用辞华美，格调也更天真，更欢畅，更富神秘色彩。而纪伯伦是苦出身，他的作品更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讲为人处世的哲理，于平静中流露出淡淡的悲凉。”

泰戈尔1861年5月7日出生在加尔各答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家庭，父亲是著名的哲学家，哥哥、姐姐也都是社会名流，泰戈尔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聪颖伶俐，备受全家宠爱。泰戈尔父母对子女管教虽严，却从不拂逆他们的个性发展。泰戈尔不喜欢学校刻板的生活，父母便为他请家教，并让哥哥、姐姐扶助。他特别喜欢音乐与写作，当他尝试着用孟加拉传统诗的韵律写出第一首诗时，尚不足9岁。这种传统文化的艺术熏陶，给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15岁发表了第一首散文诗《野花》，17岁出版了处

追怀泰戈尔

□彭龄章谊

女作《诗人的故事》。同年赴英留学，初学法律，后转入英国文学与西方音乐研究，回国后专心文学创作。

20世纪初，泰戈尔接连遭遇不幸：丧偶、丧女、丧父，这一系列打击，使他深感人生的悲惨，这种哀伤也表现在他的《回忆》《渡船》等作品中。20世纪初，也是印度反殖民主义运动蓬勃兴起、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他没有沉湎于个人的不幸，而是积极投身民族独立运动，1910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戈拉》，真实反映印度社会生活各层面复杂的纠葛，塑造了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战斗者的形象。同年，使泰戈尔后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并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诗集《吉檀伽利》在印度出版。这本诗集最初是用孟加拉语按孟加拉传统抒情诗的格律写的，虽在国内获得好评，却没有太大的国际影响。也是这一年，他旅居伦敦后，开始将《吉檀伽利》《渡船》与《奉献集》中的部分诗译成英文，仍用《吉檀伽利》的书名在伦敦出版。“吉檀伽利”是孟加拉语“献诗”的音译，诗集中除歌咏爱情、友善、景物、风光之外，还有一些带有神秘色彩的颂神诗。这是泰戈尔受印度传统的泛神论——“梵我合一”哲学思想影响的反映，他颂扬的并非宗教意义上的神，而是诗人追求的理想与光明的化身。正如郭沫若所说：泰戈尔“只是把印度的传统精神另外穿了一件西式的衣服：‘梵’的现实，‘我’的尊崇，‘爱’的福音”。为了更自由地表达原著的思想，他摆脱了原诗格律的桎梏，将它们译成富有韵味与节奏感的散文诗。令他自己也未料到的是，这本书一面世，立即轰动了伦敦与西欧文坛，他因此荣膺191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诺贝尔奖这样写道：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篇，这些诗不但具有高超的技巧，并且由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便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

泰戈尔是印度与亚洲第一位获得这一崇高荣誉的人。他的文学创作随之进入又一个高潮期，相继出版了《园丁集》《新月集》《飞鸟集》《流萤集》等散文诗集；《春之循环》《红夹竹桃》等剧本；《四个人》《家庭与世界》《两姐妹》等中、长篇小说，以及《中国的谈话》《俄罗斯书简》等散文、随笔。其中对中国作家与读者影响最大的，可能要数1916年出版的《飞鸟集》了。《飞鸟集》包括325首寓情于景、于物，充满哲理的无题诗，大多数只有一两行，几乎全是诗人电光火石般对自然景物刹那间的印象、联想与感悟。它最初的中译者、著名文学家郑振铎说，这些诗“像山坡草地上的一丛丛野花，在早晨的阳光下，纷纷伸出头来。随你喜爱什么吧，那颜色和香味是多种多样的”。《飞鸟集》内容包罗万象，泰戈尔用他那颗赤子之心和博大、深邃的人生哲理，抒发他对人民、对生命和对大自然的挚爱。他热诚赋予一切美好事物——一只鸟、一朵云、一株草或一团萤火以鲜活

的生命，来唤起人们对理想与光明的追求：鸟儿愿是一朵云，云儿愿是一只鸟。雨点吻着大地，微语道：我们是你思想的孩子，母亲，现在从天上回到你这里来了。我的梦幻恰是一团萤火——在幽暗中闪烁着灵动的流光。天空没有鸟儿飞过的痕迹，但是我已飞过。我的心是旷野的鸟，在你的眼睛里找到了他的天空。我的思想随着这些闪耀的绿叶而闪耀，我的心灵因为这些日光的抚触而歌唱。瀑布唱道：当我找到了自由时，我找到了我的歌。那些把灯背在背上的人，把他们的影子投到了自己的前方。错误经不起失败，但真理却不怕失败。

冰心在《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文章中回忆说，她偶然读到郑振铎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立即为那些“很短的充满诗情画意的哲理的三言两语的诗句”倾倒，她也尝试着“把自己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这便有了《繁星》和《春水》。她在《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中深情地说：“泰戈尔！谢谢你以快美的诗情，救活我天赋的悲哀；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1953年她赴印度访问了75天。她说，在印度尤其是在孟加拉语的省份，时时都能感受到人们对泰戈尔的热爱，他的长长短短的诗歌在男女老幼的口中传诵。她认为泰戈尔的伟大成就在于他在印度社会剧烈动荡、变革的年代，奋力“排除他周围纷繁杂乱的、多少含有殖民地化的东西、从英国传来的西方文化，而深入研究印度自己的悠久、优秀的文化”。他身体力行“进入乡村，从农夫、农妇、瓦匠、石工那里听取了神话、歌谣和民间故事，然后用孟加拉文字写出最朴素、最美丽的文章”，并参加与领导了印度的文艺复兴运动。

其实，泰戈尔的成就还不限于此，他还是作曲家、画家与社会活动家。他一生创作过1500余幅画作，两千余首歌曲，其中许多热情洋溢的爱国歌曲曾鼓舞印度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人民的意志》与《金色的孟加拉》分别被选定为印度与孟加拉的国歌。

泰戈尔对中国文化十分推崇，1924年4月，由著名诗人徐志摩热情推动，梁启超、蔡元培等以北京讲学社名义邀泰戈尔访华。泰戈尔把此行定义为“向中国古老文化敬礼和修补印中两大古文明的交流”。他由上海、杭州抵达徐志摩家乡嘉兴海宁硖石镇时，“观者如堵，各校学生数百名齐奏鼓乐，群向行礼，颇极一时之盛”。在北京他会见了梁启超、沈钧儒、蔡元培、梁实秋、梅兰芳等名流。徐志摩、林徽因还联袂演出泰戈尔的剧作《齐德拉》，庆贺他64岁诞辰。北京各报刊登

了银须银发、一袭长袍的老诗人，在徐志摩、林徽因搀扶下在天坛游览的照片，说明是：“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一幅苍松竹梅的三友图。”然而，泰戈尔此行听到的并不都是颂扬与掌声。当时中国正处在殖民主义列强与封建军阀双重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方兴未艾，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提出“以俄为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泰戈尔主张的非暴力的泛爱主义，“用心中感情的溶液，融化外部世界”，在心智的帮助下，对人心来说，抵达重塑的世界的道路是畅通的”（泰戈尔《文学意义》）显然不合时宜。因而，也受到左翼文化人瞿秋白、茅盾、沈泽民等的呛声，要“激颜厉色送他走”。这也让我们联想到，上世纪50年代在北大最初读泰戈尔的诗作时，曾惊异除了我们熟悉的马雅可夫斯基的“无论是诗/无论是歌/都是炸弹和旗帜/歌手的声音/可以唤起阶级”，以及郭小川在《致青年公民》中反复叮嘱，要我们“投入火热的斗争”，“斗争/这就是/生命/这就是/最富有的/人生”这类雷霆、号角般激越的诗句之外，竟还有如此美妙的乐音！可是，随着政治运动的深入，不仅泰戈尔的诗文不敢再读，连每日从早到晚座无虚席的图书馆也空无一人，因为谁也不愿被扣上“走白专道路”、“不关心政治”的帽子……

到20世纪30年代，残酷的社会现实也让泰戈尔认识到非暴力的泛爱主义拯救不了社会，他的诗作也由过去那种蕴涵哲理的轻快小诗转向了尖锐的政治抒情诗。如他在《责问》中，就直面宇宙的主神薄迦梵：“薄迦梵/世世代代，你向这无善的世界/一次派遣救世的使者/他们宣扬要宽恕一切罪孽/热爱所有的人/从心里摒弃仇恨”，而现实却是：“暴力戴着面具/在伪善的夜幕里戕害无辜/面对无力控制的强权的罪恶/法律裁决在幽僻处无声地鸣咽……”诗人说：“今日，我的横笛吹不出乐声/喉咙已经塞塞/晦日牢笼似的昏黑/把我的祖国囚于噩梦之中/我因此含泪责问：薄迦梵/毒化你空气的人/扑灭你光华的人/你难道也饶恕，钟爱他们？！”

1937年日寇发动侵华战争，泰戈尔多次发表诗作、公开信和演说，表达对中国人民的同情、支持反对日寇的谴责。同年他在圣地尼克坦国际大学，创办了中国学院，并发表了著名演说《中国与印度》。1941年，泰戈尔在病中写了最后一篇演讲稿《文明的危机》，宣布自己年轻时曾有的对欧洲、特别是英国文明的信念，由于他们对东方殖民地的精神掠夺与榨取，已经彻底破灭。他满怀信心地预言：“从太阳升起的东方，黎明将要到来。”这年8月7日泰戈尔与世长辞。

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各种版本的泰戈尔著作得以在国内广泛流传，我们也因此再次走近泰戈尔。拂去历史的尘埃与偏见，可以对他有更全面、更客观的了解与认识。只是，随着岁月流逝，年轻时曾读过的警句，竟未留下多少印象，譬如，泰戈尔说，“暮色渐浓，得抓紧多赶些路”。半个多世纪后重读，直觉得这是这位银须银发、一袭长袍的哲人对我们的谆谆叮嘱。以至一提起泰戈尔，耳边便响起这警语，催促我们勿勿“赶路”……

■土地与生长

沐浴在伟大灵魂的光焰中

——关于《石瑛传》的写作

□宋清海

说来颇有惭愧之感，在我写作《石瑛传》之前，尚不知石瑛先生是何许人。我是2007年夏在鸡公山上听到石瑛这个名字。朋友说此人在1905年1月于布鲁塞尔协助孙中山创建同盟会，曾任孙中山军事秘书、全国禁烟总理，两次留欧17年，第一次留欧前中清光绪癸卯科举人……我当时只是听故事。在朋友提出要我为石瑛先生作传时，我立即婉拒。原因当然有很多，他是国民党元老，有关史料的收集定非易事；对某些历史旧案的评价分寸也难以把握，况且我不是湖北人，对产生这样一个人物的历史文化背景和风土人情背景不甚了解，等等。但令我最畏难的，是我不能进入这位学贯中西的人物的学养世界，作者与传主之间在修养上不可同日而语。朋友却坚持要我写。而且为石瑛先生作传，是武汉市政协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活动之一。因此，我只能答应先看看有关资料再决定。

在看过部分资料之后，我反而更加畏难，石瑛先生是国民党“一大”由中山先生亲笔书写名单的24位中央执行委员之一，之后历任高官，在民国时期即被时人誉为：“民国以来第一清官”、“现代包拯”、“不让海瑞、于谦”、“布衣市长”、“湖北的圣人”、“现代古文”、“正义的化身”……以我这种在“破四旧”年代里成长起来的人的学养，实在写好这等人物。最后在难以推脱的情况下，促使我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是石瑛先生在台湾和海外的学生、旧属以及他们的后人写的怀念石瑛先生的文章。我能见到的文章有些是20世纪80年代写的，令我感动的不仅是文章所记之事。石瑛先生逝世于1943年，也就是说在他逝世半个世纪之后，仍有民间人士著文怀念他，

而这些人与他已无丝毫利益关系了，那纯粹是崇敬之情的驱使，可知那是怎样一个人了。

我先确定了石瑛先生的精神内核——一个继承了传统士大夫风骨、具有现代科学民主精神的旷代爱国知识分子。之后，我用一年多的时间研究有关资料。这当然首先是辛亥革命的历史。毛泽东曾说过，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孙中山先生的事业的继续。辛亥革命的意义不容置疑。辛亥革命为什么会爆发，辛亥革命前的百年历史铸成了原因；辛亥革命百年来的历史，证明了辛亥革命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历史转折点；展望辛亥革命的下一个百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必将实现的。

关于湖北的历史文化，特别是石瑛先生的原籍湖北省阳新县的历史、风土人情也是必须要了解的。“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不把人物放在历史文化、地理、风俗的“原生态”环境中，难以得到性格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当然，还得熟悉与石瑛先生有关的同时代的人们，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敌人。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必定是众多精英人物共同推动了历史车轮。

在基本熟悉上述情况之后，我为写作定下了几个框子：一是把人物放在民国史的大背景下去表现，写出鲜活的人物来；二是追求“民国原味”，人物言行必须有民国的时代印记，以语言为例，民国时代知识分子的语言是最有特点的，他们熟读古文，又处在白话文改革的时代，他们得到了汉语之源，又开拓了汉语的现代之流，他们的“文夹白”既不生涩又不平淡无味，很得汉语的妙用；三是学习司马迁的传记笔法，以史实为根据，从主人公的童年、青壮

年到老年，写出长篇传记，真实地表现石瑛先生的一生；四是不刻意突出党派、政治斗争，又不脱离党派、政治，但要统一到中华文化这个根本上来。石瑛先生是国共两党都承认、肯定的人，这在民国时期是比较少见的现象。与其说这是石瑛这个人物本身的魅力，不如说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这个人几乎可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化身”。

在写作中，随着对石瑛这个人物的了解、理解的加深，我发现我最初定的框子还不足以准确地表现石瑛先生的思想和全部精神世界。比如：在那个新旧文化、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时代，石瑛先生既不固守传统，也不主张全盘西化，亦不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调和道路，中西文化和传统与现代在他身上实现了完美的统一。这在清末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是极少见的现象。因此，书稿再三修改就不可避免了。

本书虽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还是有不少遗憾。有许多资料不在大陆，我无法看到。但本书的写作使我大为受益，我总算了解了一点民国历史，我追寻石瑛先生的生命轨迹，沐浴一个伟大灵魂的烈烈光焰，心灵穿行于民国历史的波澜之中，才知那是一个伟大而混乱的时代，一个黑暗与曙光同在的时代，一个死亡与新生大搏斗的时代。我也总算认识了民国人物身上的特质——于传统而言，他们国学根基深厚，于现代而言，他们汲取西学精华，我终于明白那个时代为何大师灿若群星！我也深深感到，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爱国之心是今天的人难得比拟的。

一个无愧于历史的人，历史终不会忘记他。



葡萄架下(国画) 杨之光 作

原上草

刊头题字：臧克家

第153期

■阅读时光

有人说香港是文化的沙漠，但梁文道却很不以为然。他举例赵广超，说他是香港人中对于中国文化最有贡献的人物之一。因为赵广超前无古人地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作书”方式，不只是普及了中国传统视觉文化的精髓，而且还可以让年轻一代爱上诸如《清明上河图》这样的艺术经典，同时他还另辟蹊径，为中国传统文化找到了一条重新进入的通道。赵广超的写作总是图文一体，这些也都只是他进行表达和研究问题的手段与工具，为此，他不惜以牺牲自己的健康作为付出的代价，极尽苛求，不断地追求完美和卓越，以至连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在看了他所绘制的《大紫禁城》之后，也希望这位香港人能够到北京去制作最新的官方导游手册。梁文道在著作《访问》中介绍了这项独特的工作方式：“这种‘作书’方法非常困难磨人，赵广超必须先把许多图画扫进电脑里，再一笔一画勾描出原图的轮廓和结构，然后才能放大、缩小与变形，好突出想说明的重点。其中耗费的时间心血真不足为外人道，赵广超的身体就是在这种经年累月的工匠式苦活里累垮的。”

二

趁着耳目清明未染俗尘，每天等报纸一来，连头版头条的新闻都顾不得看，直接就翻到董桥专栏的那一版。这样热衷于董桥文字的情形，不仅是梁文道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此，许多香港的大众读者均是如此。董桥的文章真是太好了，而他的著作也做得真够精致，书中里外的用心，真可谓相得益彰的绝配。梁文道买到董桥新出的一册文集《绝色》，很喜欢这册著作的装帧，墨蓝精装、压烫金边，富丽又淡雅的16开小书，但他拿在手中却总感觉有些不对劲，翻来翻去，终于把书背后由书店贴上去的标价给摘了，这才算踏实。如今电子书的风潮席卷全球，爱书人都怀疑印刷品是不是快要消亡了。读了董桥的这册《绝色》，梁文道心里更似有了定海神针一般的沉静：“其实当年美国善本热的背后，卖的就是这种心理。他们怕大众报刊、唱片和收音机会取代伟大的文学经典，于是要用最精致的品相保存书文化的命脉。或许将来会再有这股风潮，就让其他人继续看手机小说吧，我们自己印自己的《绝色》。”

三

香港浸会大学主办“《红楼梦》文学大奖”，以当前华语文学奖项的最高奖金来鼓励华语小说的创作，据说首届的小说大奖最后是在作家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和董其章的小说《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之间进行角逐。尽管评委最终选择了前者，但在俗文学大行其道的香港，董其章以极为精巧的构思和极为繁复的结构，将香港严肃文学的水准推向了一个很高的精神境地，意义实在非凡。为此，梁文道在他的著作《我读》中谈起这部小说，很为未能获奖有些不平，因为清贫的香港小说作家董其章，其实更需要这笔丰厚的文学奖金。董其章的得意弟子王贻兴20岁出头便获得了香港中文文学的双年奖，如今却是电视娱乐节目主持人，他在香港从事严肃的专业文学写作，真是太过于清贫了，诸如恩师董其章这样优秀作家的小说作品，最多也只能卖到1000册而已。王贻兴父亲的修理电器，一次去一位老伯家修理电视机，那位老伯说他原来也写作，家中藏书有很多，但现在家庭拮据，连修理电视机的费用都拿不出，只能送一册自己没有卖出去的著作抵用费用，而王贻兴一看，简直是大吃一惊，原来这位老伯便是香港著名的作家海辛，之前他刚刚从图书馆里借来了一册《海辛卷》，准备认真地阅读。

四

陈智德是梁文道的好友，也是一名诗人，研究过一段时间的文献学，如今专攻香港新诗史，尽管在接受梁文道的访问之时，这位陈智德博士已经失业了约有一年之久，但他最大的爱好依然是去旧书店里不紧不慢地淘书，他说自己喜欢逛旧书店而不喜欢在网上淘旧书，因为“逛旧书店是很随意的，仿佛喝了一杯咖啡或饭后的散步”。而在旧版书与新版书的取向上，他更喜欢前者，这是因为原版书与再版书在一些细节上是会有很大的不同的，“而且你读原版书时，你会觉得那就是当时的作者或读者所看见的模样，仿佛重返作者新书发布时的面貌”。同样，读旧书还有另外一个收获，那便是“有时候你会在其他旧书中发现相片、剪报、书签、邮票甚至钞票，一个活过的人留下的痕迹”。“你会发现一位跟你一样喜欢同一本书的前辈，有一种传承的感觉，我仿佛在继承他的阅读，他们会在书里面写上评语，笔记……”

五

香港有一家十分独特的独立出版社，名为“进步”。之所以说他独特，且听梁文道在文章《十年进步》中所讲的传奇，他的朋友吕大乐教授替“进步”写书稿，不但拿不到分毫的版税，而且还得拿出一笔“赞助费”，也就是说出版这册著作，必须自己负担成本，如果这册著作卖得不错，万一赚了点钱，那么这笔钱就算捐献给出版社了。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位辛勤写稿的吕大乐教授晚了一天交稿，结果竟遭到出版社的违约罚款，最后以吕教授捐赠一台大型的冰箱作为罚金的补偿。但即使是这样奇怪的出版社，如今也已经运行了10年，他们为了庆祝“进步”成立10年而不倒，在2007年出版了一套“进步十年”系列的10本小书，其中便包括张炳良的《管治香港的难题》、徐锦锵的《老师没有告诉我》以及吕大乐的《四大香港人》等著作。梁文道评价这10册著作，“本本硬桥硬马，绝无废话，没有无病呻吟，更不讲市场噱头，一派孤身走我路的风范”。

六

青文书店是香港二楼书店最为著名的一家，它以售人文书箱为使命，但终于有一天，店主罗志华已经穷到连移动电话的话费也交不起的地步了。农历二十八那天，他独自在拥挤狭小的货仓里清理藏货，准备关门歇业，但不小心被意外坠落的层层叠叠的书籍压住，窒息而死。过了数十天，邻居们才从扑鼻的气味中得知他的死亡，等到破门而入时，发现他的遗体整个地埋在书堆之中了。梁文道之前在青文书店里发现两套中国美术史权威高居翰（James Cahill）的著作汉译本，分别是《气势撼人》和《隔江山色》，硬盒精装，插图印刷得十分精美，因为这两套书太重，于是便请店主